

青春毕业,成了岁月(1)

◆ 宋梅

人的一生中,需要多少次毕业?怀念是要等到岁月积累之后,处在当下的年轻,是不会毕业的青春。等你读完上世纪父辈们的毕业留言,趟过时间的河,你就会明白。——摘自2014年6期《中国周刊》

小学毕业的记忆,是摘掉了胸前的红领巾;初中毕业的记忆,是暗自惜别了小小萌动的异性相吸;高中毕业的记忆,是疯狂撕碎了厚厚的高考习题;大学毕业的记忆,是在火车站一次又一次泪别了来自四面八方又回到四面八方的同学。对很多人来说,还会有很多毕业:研究生、博士生、EMBA、培训班、进修班……有些人还经常将一些特别经历的完结当做一次毕业:艰苦的奋斗、曲折的创业、火热的从军、刻骨的恋爱……或者,深陷一次身不由己的社会运动。无论如何,每一次毕业,都是一次人生的成长。无论如何,每一次毕业,都是一次命运的流转。无论如何,每一次毕业,都会留下一次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又是一年夏日,又到了毕业的季节。正在毕业的,赶快呼唤同窗好友,写下离别的赠言。那也许是你能够听到的最纯净的真话。已经毕业的,翻开发黄的留言簿,追忆曾经的如水韶华。那肯定是你再也回不去的青春年代。

时代不该忘记他们

“祖国需要矿,我们就上山去找。”

——上海同济大学天文大地测量系1960届毕业生松老先生毕业赠照后面的留言

松老先生这一代人,是唱着《毕业歌》告别校园的。这首由田汉作词、聂耳作曲的高亢

之歌,创作于1934年,却一直影响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莘莘学子。“同学们,大家起来,担负起天下的兴亡……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,明天是社会的栋梁。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,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!”这样的旋律和歌词,松老先生至今耳熟能详。

“所有的日子,所有的日子都来吧,让我编织你们,用青春的金线,和幸福的璎珞,编织你们。”王蒙的这段《青春万岁》,是松老先生这一代人的内心写照。“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。”这几乎是他们分手时异口同声的勉励和祝愿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,就是如此高亢、激昂。那时候,整个中国就像烧着一团火,而他们的心里也烧着一把火。而今,他已年届八旬。谈及当年,依然火热:“我们这代人,当时都是这个样子。”“祖国需要”这四个字,主导着他们毕业的脚步,也决定了他们今后的命运。被“需要”到好地方、好单位的人,可能成为了科学家、领导干部,而今功成名就;而被“需要”到艰苦地方的那些同学,有些则最终在艰苦中光荣退休。

但是,松老先生可以肯定,所有人都会是无悔的。因为,当年的选择是真诚的,未来的岁月是身不由己的。虽然,如果把这样的毕业留言拿给今天的年轻人看,他不知道得到的会是尊敬还是嘲笑;虽然,他知道在今天的学生毕业留言中,可能不太容易再找到这样的誓言。但是,岁月已经把他们这一代人装订成了一本书,而书的开头,就应该这样,也必须这样,才是他们真实的自己。

“青春,是人生旅途的第一个启程点。自己未来的道路,究竟是康庄大道,还是羊肠小路,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于刚刚要迈开的这一步。”

——摘自河北南皮中学1964届毕业生王俊慧的毕业留言本。留言者当时忘记写下自己的姓名。一个小小的本子,一直珍藏了整整50年,不仅保存完整,而且随手就可以找

到,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而翻开毕业照和毕业留言本,对每一位同学都能不加思考地叫上名字,并且讲出他们在学校时的音容笑貌、出身和趣事,对这位古稀老人来说,已经接近奇迹了。

在对每一个同学的讲述中,老人都不忘要说上一句:“这个人考上大学了”、“这个人没考上”。她就是“没考上”中的一个。但在“考上”的同学中,有一个男生后来成了她的丈夫。这一点很重要。因为在后来的日子里,“考上”的人成为了一个群体,“没考上”的成为了另一个群体,两个群体几乎不相往来。更准确地说,这是两个阶层—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阶层。

“当时要想从农村走出去,只有两条路:上大学和当兵。实际上,所有现在有头有脸的人,除了当兵当出了一位将军之外,其他清一色全是当年考上大学的。没考上大学的,只能回家务农种地,没有别的选择。”近些年,他们老两口几次应邀回家乡参加同学会,发现每一次聚会都是那些人。为什么不能多找一些人来呢?明知道很多人就在老家,一辈子都没离开过。“都这么大岁数了,四五十年没见了,确实非常想念。”

组织者告诉记者,不是没邀请,而是每一次都千方百计地邀请,但人家就是不愿来。原因就在于,已经分隔成了两个阶层,不管你心里是怎么想的。“究竟是康庄大道,还是羊肠小路,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于刚刚要迈开的这一步。”老人念叨着这句未署名的留言,怅然若失地点着头。

就在留言的那一刻,康庄大道和羊肠小路已经泾渭分明。

或许直到50年后他们才明白,就在那一刻,他们能够得到的,已经得到了,是一切;他们注定失去的,已经失去了,是永远。

这是中国一代人的得到和失去。

“他们没有毕业留言。顾不上,也没心

情。”—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1978届北京大学地质系工农兵学员毕业生对《中国周刊》记者采访要求的回应。找到他们很难,得到的回应也大都如此令人失望。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,说他们是一代人似乎不太准确。他们的身前和身后,是两个世界。而他们自己,正站在两个世界中间的门槛里,窄窄的存身处,尴尬地继续往开来。

那时的大学新生直接从工人、农民和士兵中推荐产生,不用通过高考。报名者必须具备三年以上的工农兵资格,名额实行分配制。由于在劳动中荒废了学业,以及新生的水平参差不齐,一些教授曾抱怨,不少工农兵学员的水平还不如“文革”前的中学生。有人评论说,“工农兵学员”是世界教育史的一大笑柄。这位接受《中国周刊》记者采访的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工农兵学员,是1974年入学,曾经根正苗红,风光一时。但随着拨乱反正,1977年全面恢复了高考。在1977级那些凭借真才实学中榜的大学生面前,他们这批工农兵学员相形见绌,自惭形秽。到1978年毕业时,他们个个灰头土脸,哪还顾得上什么毕业留言。

从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,到1977年恢复高考,整整十年的高考空当中,是他们的大学年华。而他们的毕业,意味着迷失。

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他们的境遇,《中国周刊》记者特别采访了几位北大中文系1982和1983级的大学生,他们当年在校期间,都曾或多或少地接触过“工农兵学员”身份的授课老师。对这样的“资历”,开始时学生们确实有些不屑,但慢慢地,这些“工农兵学员”老师们的学识、人品和敬业折服了大家。这些留校任教的“工农兵学员”,无一不是经过“回炉”和不断深造才得以胜任教书育人大任的,如今已多是拥有博士生导师、教研室主任等头衔的学科带头人。然而,提及“工农兵学员”这段学历,他们的态度是:不堪回首。

时代不该忘记他们。因为他们的毕业周期,比任何一届学生都要长。别人毕业的,是学历;他们毕业的,是人生。

在这个群体中,有一个人叫习近平。

“前面的路还长着哪。红帆船会来的,启明星会升起来的。”——摘自四川医学院卫生系1982届毕业生陈希宁给同学张晓蓉的毕业留言

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

[美] 迈克尔·富利洛夫

33.会见丘吉尔

多诺万在英国期间,能够隐秘地会见了包括孟席斯在内的英国官员。他没有被媒体所干扰。他的访问和萨姆纳·韦尔斯的访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:没有宣布,几乎也没有报道。

到英国后的整整一个星期,多诺万在英国海军部获得了详细的通报,在那里他会见了作为丘吉尔继任者的海军大臣、工党政治人物A.V.亚历山大。多诺万还会见了海军情报局长,海军少将约翰·戈弗雷,他后来成为很重要的朋友,帮助多诺万成为美国情报机构首脑。在空军部,多诺万会见了自由党人,空军大臣阿奇博尔德·辛克莱爵士,并与其讨论了他一贯提倡的让美国志愿者加入英国皇家空军的设想。多诺万还在美国大使馆与美国武官雷蒙德·E.李陆军准将共进早餐。将军此前就肯尼迪针对多诺万的负面评价与之争锋相对,此次和多诺万一见如故。多诺万告诉李武官,鉴于在华盛顿讨论了关于和平时期的征兵法案,他在伦敦做的工作中还包括想获得关于伦敦征兵法的第一手知识。他对李说美国关于征兵的态度“将考验我们的灵魂”。

7月25日星期四下午晚些时候,多诺万在唐宁街10号会见了温斯顿·丘吉尔。此前,包括英国驻美大使洛西恩勋爵和外交部的罗伯特·范西塔特爵士在内的多方人士敦促首相举行此次会面。他俩对这位总统代表的观点要比前一个代表友好得多。范西塔特建议说,让首相会见多诺万是为了让他把英国对驱逐舰的迫切需求带回美国。“哪怕和他交谈十分钟就能很容易地把这个话题提出来。”范西塔特写道,“如果你能抽出时间,你无论如何都应该和他见一下。他是位重要的人物,而且将来会对我们更加重要。给他这份荣幸很可能将来会有所回报。”

尽管这次会见没有见诸任何报道,但据说多诺万被丘吉尔周围环境的闲谈式的,贵族气派的和带有“18世纪氛围的风格”惊呆了。会见是在无休止的午餐和晚宴中进行的,在这样的氛围里,非工作人员(比如,女人)有

时和官员同样重要。

当晚,多诺万和海军少将约翰·戈弗雷在时尚的皇家泰晤士河游艇俱乐部共进晚餐。这位严厉的海军间谍首脑是詹姆斯·邦德系列小说中人物M的原型之一。詹姆斯·邦德系列小说的作者伊恩·弗莱明中校是戈弗雷战时的副官。有些美国人认为戈弗雷阴险狡诈,但多诺万很快就喜欢上了他。他告诉戈弗雷说,有人警告过他,认为英国人“不易相处,遮遮掩掩,居高临下”。他真实的体验是恰恰相反。

周末,多诺万和英国军队的朋友四处走走闲逛。他参观了几个军事基地,并在索尔兹伯里平原以及英格兰南部几个地点观看了军事演习。星期天晚上,多诺万驱车前往温莎,和乔·肯尼迪在他名为圣伦纳德的乡间别墅共进晚餐。因担心伦敦被轰炸,故从一位美国汽车公司继承人那里租来了这座拥有70个房间的庄园。参加晚餐的还有柯克,他希望这顿饭能够一扫两人之间的芥蒂,但事与愿违。多诺万后来自夸说他批评了乔·肯尼迪,说:“美国的政策是用一切方法去提供帮助。而喋喋不休地对英国人说他们没有任何机会,这并不会起到帮助的效果。”当晚,多诺万为了会见肯尼迪,他放弃了有丘吉尔举办的一个舞会。舞会由公认的上流社会美女黛安娜·库珀夫人在多尔切斯特主办。她是风流成性而臭名昭著的新闻部长达夫·库珀的妻子。多诺万给黛安娜送去鲜花以表歉意。为此黛安娜夫人回信表示感谢,信中颇露风情媚骨。亲爱的疯狂的上校;

非常感谢你送的黄色玫瑰花。她让我对缺失了你的陪伴稍微好受一点。很遗憾我们两国之间的利益关系成为我们之间的隔阂。我很高兴告诉你温斯顿表现了他最有趣、最活泼的状态。我确信你也会完全喜欢这次舞会。为你高兴,我美丽的伊芙·居里(皮埃尔和玛丽·居里的女儿,参观了在伦敦的自由法兰西运动)和我最美丽的侄女也参加了舞会。但愿你和乔也度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。我也希望能改日和你共进午餐或晚餐。

你的黛安娜·库珀

至于多诺万是否改日和黛安娜夫人一起用餐,历史没有记载。

34.接连召开董事会

阿祥本来想把这段时间的五等船票恢复到5角,他找承德商量,承德说就不要动了,因为清明客运时间短,等到把船票提高,很快又到淡季了。况且,跟着外国人升降降,似乎被他们牵着鼻子走,心里感觉很不好。

承德的判断不错,清明过去才3天,客人马上直线下降。有几天,客轮公司的客船上客率只有七八成,至于英法公司,他们几乎已经跑空船了。

暴风雨应该来了!果然,英法公司发力了,这次他们降价力度特别大:五等船票只卖3角5分。看来,英法公司诚心要与客轮公司背水一战,不弄个鱼死网破绝不罢休。

这一波价格战,客轮公司受到了重创,一时,两家公司客源出现了五五分状况,虽然相比较,英法公司亏损更大些,但是每天几百大洋的亏损,让阿祥背上了沉重的压力。

怎么办?阿祥愁死了。面对英法公司咄咄逼人的攻势,阿祥接连召开了两次董事会。这两次董事会争论实在太激烈,现在,董事们分成了3派,一派退让派,一派斗争派,还有一派妥协派。参加退让派的一些股份中等的董事,他们的意见是,既然继续降价公司亏损严重,倒不如暂时停航一段时间,等英法公司亏不起了再东山再起。主张斗争的那派由一些大股东组成,其中以章承德最为坚决。承德的看法是,既然英法公司把阿祥逼到了死路,阿祥也不能示弱,如果阿祥这次采取退却,今后不仅失去了客运市场,也失去以后阿祥与外国商人竞争的信心,更不可估量的是社会影响,社会会因此对宁波商人信誉度大打折扣的。至于那些妥协派,他们基本上是小股东,从股份份额看,他们占据的比重不大,而且,代表他们利益的董事也就两三个,但是他们人数众多,那些靠多年积蓄投资入股的下层宁波人,他们原来指望通过入股可以增加些收入,以此改善他们的生活,哪里料到现在不仅赚不到钱,而且很有可能让他们的本金大幅缩水。对他们来说,几十上百元大洋,凝聚了多年打拼的汗水,所以,他们最不愿看到因为争口气,把钱给争没了。他们的想法是,马上派人与英法

公司谈判,拿出一个有利于双方的办法,让这场竞争早点结束。

看着大家争论不休,阿祥心里乱成一团麻。站在董事长立场,他必须要主持公平,让大家意见统一,这样他才能下定决心。从个人立场而言,他本人是支持斗争派的。他觉得,只有斗争,才能取得最后主动权,其他两派的想法,其实已经注定客轮公司在本次竞争中的失败。这口气他咽不下。“请诸位董事安静一下,我想说几句话。”在一片嘈杂声中,承德站了起来,“刚才大家都讨论到了,如果阿祥现在停航,每天也要亏损五六百元,一个月将近两万元,这样大的亏损阿祥亏不起。至于说到现在与英法公司谈判,我觉得实在不是时候,那些外国人本来就很傲慢,看不起阿祥中国人,阿祥找他们谈判,实际上就是认输。所以,我的看法是,只有与英法公司强硬到底,才有可能获胜!”

承德呷了一口茶,见大家还在等他说话,于是又说:“刚才我测算了一下,假如阿祥现在用英法公司一样的票价与他们争客源,每天亏损大概是七八百元,与停航相比较,每天将多亏损200元左右。但是阿祥这多亏损的200元有价值,一方面,阿祥的亏损,得到好处的是阿祥宁波同乡,另一方面,算是给阿祥算投资了。所以,我觉得这笔亏损值得。至于那些小户,他们的钱来得确实不容易,公司亏损,他们是最不愿承受的。在这里我表个态,如果那些小户愿意,我可以用原价收购他们部分股份。不过,我要把话说清楚,到目前为止,由于阿祥前期有些赚头,公司现在还是有些盈利的。”说罢,承德坐下,等别人发言。

“章老板,你讲的有道理,我同意依的看法,只是我想问,你判断一下,假如阿祥跟外国人硬拼,依估计大概多少辰光这场竞争可以收场?”提问的是张才发。“这个不好估计。”承德干脆说。“所以,问题难就难在这里,假使两三个号头就可以收场,这个亏损阿祥可以接受,不过要是拖上半年一年,我看阿祥人都顶不住。”才发还是一口宁波上海话,他说的“号头”就是“月”的意思。才发讲完这些话,下面又是一片议论。

宁波商人

徐志明

